

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 协调推进机制*

谢来辉

摘要：统筹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协调推进，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突出标识，也是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分析了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内涵及意义，认为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国际合作模式的突出特征，对于理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讨论了“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分析了当前统筹推进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应基于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目标层次进行统筹推进。最后提出了完善统筹协调机制的具体举措。

关键词：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谢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DOI:10.16845/j.cnki.ccieeqqh.2025.05.002

完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重点任务。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并且明确提出完善九个具体领域的机制。党中央的相关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指明了任务和方向。其中，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以及与共建国家人民之间的“心联通”，是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重要方向，对于理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和路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文献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不足，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讨论完善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内涵及意义，进而探讨实现统筹协调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4YZD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突出特征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做到“三个统筹”。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其中的“九大机制”中包括完善“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①

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突出特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时，强调它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突出表现为以“五通”为代表的、具有许多创新性的行动路径。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现有文献对于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内涵和意义讨论明显不足。国外有不少文献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驱动力中包含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因素。比如，都强调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来推动经济增长（Alves and Lee, 2022; Mayer and Zhang, 2021）。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理论本质上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并没有区别，都是资本在寻求“空间修复”的逻辑（哈维，2017; Summers, 2016; Jones and Zeng, 2019）。这些观点显然没有认识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核心差别，因而具有明显的误导性。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明显的“发展导向”特征，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尽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力量下主导推动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近数十年来在不断否定国家的作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我们长期以来低估了政府作为保险者、保护者、教育和医疗的出资者、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产品的供应者、外部性的管理者、垄断的监管者、经济的稳定者、收入的再分配者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忠诚的聚焦点的长期职能（Wolf, 2017）。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形成“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关系在组织和功能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了明显破坏性作用。相比之下，共建“一带一路”强调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对接，强调“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纠正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必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导向”。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强调要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体现出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以及对新发展模式的探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往往只强调规则标准方面的联通，比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而且侧重输出其国内的各种规则和

^①资料来源 《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华网，2024年12月2日。

标准。实际上,缺乏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合作,可能不利于甚至阻碍后发国家发展空间的拓展。

更加科学全面认识经济治理的相关机制,有助于理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Dixit (2008) 认为,经济治理是创立和演化而来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通过保护财产权、执行契约以及共同提供物理和组织基础设施来支撑经济活动及交换。从经济学理论上,经济治理至少应该对应三类经济制度:第一类保护财产权免遭其他行为体侵占;第二类保障行为体之间达成的自愿契约得以执行;第三类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并发挥监管作用,促进经济活动和前两类制度的运作 (Dixit, 2008)。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一般只强调前面两种经济制度,即财产权的保护和契约的执行,对于基础设施的相关制度的研究则明显不足 (Dixit, 2008)。

最后,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国际合作原则和规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的创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发生的从内嵌的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应的规则和程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Cohen, 1982)。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的秩序转型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制度变迁。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双重标准的规则,约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Wade, 2003); 瓦解第三世界的团结,迫使发展中国家进入“赛道”,彼此开展激烈竞争,以努力符合既定的政策要求来获得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机会 (吉尔平, 1989)。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达国家的投资或援助经常需要以国内政策的一致性为前提条件,也往往被迫接受西方国家强加的发展模式。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作的基本特点。相比之下,共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强调要不断拓展共同发展的新空间,反对把现有规则强加给后发国家,反对输出发展模式。正因为如此,共建“一带一路”具有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标识。

二、“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之间的辩证关系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立在深刻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以往国际合作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完善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协调的机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三者之间辩证的、有机的联系。理解三个“联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刻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从理论上,“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不同层面,三者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分别对应于三个维度。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行动,从理念到实践,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如初衷是要把共建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务实的经济合作,并惠及各国人民。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强调,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①

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对“丝路精神”的认同和战略互信作为基础与前提条件,以“硬联通”作为优先合作方向,以“软联通”为扩大和巩固合作的必要支撑条件,以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心联通”为目标。三者可以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服务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① 习近平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2023 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3 页。

其次，在推进基础设施的“硬联通”项目时，需要及时加强“软联通”和“心联通”，才能有效运转起来并取得预期效果。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以后的运营和维护阶段，需要基于规则 and 标准的一体化数字系统和区域经贸伙伴关系，有机嵌入经济社会中获得支持才能有效发挥功能。单一项目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通过与“软联通”“心联通”形成一个集成系统，嵌入到当地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制度体系中去，才能形成供需有效促进的循环，取得预期的经济社会效果。互联互通项目需要人们通过“心联通”赋予其积极意义，并且通过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赋能，使其运转起来，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最后，从理论上讲，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无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产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后果，需要加强“软联通”和“心联通”方面的国际合作。“硬联通”不一定能够必然发挥改善关系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的后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创新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比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会有一些传统领域社会群体的投资价值受损或者劳动者失业。运输新通道新空间会导致价值的转移，造成负面后果。贸易畅通尽管整体上有利于全世界，但是对于不同群体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差别。从监管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跨境互联互通本身也会带来一些破坏传统社会价值观甚至是非法的流动性，需要加强跨境监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部不同政治阵营对“硬联通”项目的认知很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比如，左翼进步主义者会看到硬联通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积极贡献，而右翼保守主义者则会更多考虑大国的安全威胁。

总之，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体现高度的系统思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突出表现。“硬联通”项目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其中的安全风险和负面效果，需要通过规则和合作来及时监管，化解风险。国际合作的组织和机制必须建立在共同分享的价值观之上，规则 and 标准等国际机制要能够有效履行，具有一种共同体的意识也非常有必要，否则会非常困难（扬，2007）。

三、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面临的挑战

从以往实践来看，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硬联通”较为深入，但是“软联通”相对滞后，“心联通”效果欠佳。其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共建国家与我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互信基础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上认可“丝路精神”和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不同的共建国家由于处于受新自由主义霸权影响的不同层次，各方政治和战略互信的程度各有不同，所以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知也会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会体现为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在一些国家的认可度低于预期。比如，印度尼西亚智库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在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一份深度民调显示，该国普通民众和精英对雅万高铁项目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别。^① 只有 50.3% 普通民众知道该项目，但其

^①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Research Team. Indonesian Public and Elite Perception of Major Power Influence on Regional and Latest Geopolitical Issue, October 2024, <https://indikator.co.id/wp-content/uploads/2024/10/Indonesian-Public-and-Elite-Perception-of-Major-Power-Influence-on-Regional-and-Latest-Geopolitical-Issues.pdf>.

中 60.2% 的人认为该项目“有利”，10.9% 的人认为“非常有利”，23.4% 的人认为“不利”或“极为不利”。100% 的“精英”受访者都知道雅万高铁项目，但其中只有 3.9% 的受访者认为该项目对印尼“非常有利”，51.5% 认为“有利”，36.9% 认为“不利”，4.9% 认为“非常不利”。该民调还显示，尽管总体上印尼的“精英”受访者表示希望加强对华关系，但是除了在经济领域以外，在涉及政府和治理、教育科技、环境保护和文化交往等方面，都更倾向于希望加强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合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不断拓展，特别是随着“硬联通”建设项目从点到线成面，最终实现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与不同类型共建国家的合作必然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第二，一些域外势力的恶意干扰和破坏，损害“硬联通”项目的经济社会效果。一些域外国家出于地缘政治斗争的考虑，担心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会有安全方面的影响，因此采取了刻意抵制和打压的措施。比如，尼泊尔的佛陀国际机场和博克拉国际机场是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博克拉国际机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建设。据媒体报道，印度出于对中国企业参与承建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顾虑，拒绝印度航班在相关机场起降。由于尼泊尔对印度的严重依赖，印度的针对性政策措施直接影响了尼泊尔两个国际机场的经济可持续性。

第三，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机制存在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主体往往割裂看待“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认为自己只是属于其中一个责任板块。各方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协调配合不足的问题。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属于各种具体的工程承包企业，贸易投资规则的联通由商务部门和海关负责，《湄公河次区域便利人员及货物运输跨境运输协定》等运输通行服务政策由交通部负责推进，人文交流由文化旅游等部门负责，签证事务由外事部门负责管理。目前，这些部门相互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协作关系，但是总体上仍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机制，各自政策和行动的协调性亟待加强。

（二）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面临的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行稳致远，在于它代表着可以有效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陷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国际合作模式。正因为如此，共建“一带一路”并非西方国家所设想的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权力游戏”，而是代表着一种真正符合 21 世纪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发展潮流。当前世界仍然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后的调整阶段，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必须启动一种“重新内嵌的后新自由主义再全球化”（Bishop and Payne, 2020）。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右翼和左翼“去全球化”的政策方案并没有提供走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途径，反而还在制造更多的分裂和对抗的风险。共建“一带一路”根植于“丝路精神”，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和进步目标，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克服国家之间和国内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有可能为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提供解决方案。

尽管存在问题与挑战，统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仍然面临巨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2025 年 6 月 16 日，法国在《回声报》发表题名为《中国与美国：全球软实力的惊人转变》的文章，明确肯定了中国坚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产生的重大战略影响。通过引用全球知名民调机构益普索的民调数据，该文章指出，中国坚持国际承诺，国际形象稳步提升，全球支持率从 2015 年的 47% 上升至 2025 年的 49%。同期，美国的全球支持率从 66% 降至 46%。该文章对此历史性的转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一个国家的声誉，正是在数十年间无数日常决策的累积中逐渐铸就的”“当美国政客们热衷于短期目标时，中国战略家们思考的却是数十年的大计。2013 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如此。当初，承诺为数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时，西

方舆论曾批评这是注定失败的新殖民主义。12年后，中国正在收获硕果”。文章还特别提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的评论，“自由民主制度并非仅凭其存在就能赢得民心，它必须切实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并称“时间已成为中国的盟友”。^①

四、完善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基本方向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要完善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协调机制，其核心在于“统筹”，最终使“一带一路”建设统一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所以，深化对“命运共同体”目标的理解，对完善统筹相关协调机制尤为关键。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虚假的共同体”，最终发展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刘同舫，2018）。长期以来，受亚当·斯密《国富论》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影响，西方文献都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讨论一种“工具性的共同体”。这种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共同体观念从个体主义出发，把共同体视为工具性的，仅仅为了私人目的从事合作。这种视角强调共同利益，使人们在谈判中能够达成妥协，但是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并非基于情感或共同文化，甚至也不是基于共同的世界观，所以经常出现冲突。

与之相区别的是一种情感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其首倡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罗尔斯看来，“每个人的潜在性比他所希望去实现的要更大。……正是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们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够分享其他人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我们达到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概念，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们从彼此的由自由制度激发的美德和个性中得到享受；同时，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善是人类完整活动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活动的整个系统是大家都赞成的并且给每个人都带来快乐”。罗尔斯（2001）强调了这种共同体观念的情感特征，“这种吸引可以采取一种纯工具形式，每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作达到或保持他的快乐的工具。除非这种依恋关系和情感友谊因素相融合，否则就表现不出社会联合的特征”。这种情感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强调，产生于共同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特性的共性至关重要。这种共性和产生共性的规范使国家之间自然更容易合作（麦克唐纳、奥康纳，2018）。

上述两种共同体观念都源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传统，本质上还是属于个体主义，因此仍然是脆弱和不可持久的。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这两种理念的融合。但是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的这种“特殊关系”本质上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发生破裂，因此不是“真正的共同体”。

在理论上，还有一种“构成性的”共同体观念。这种共同体观念的突出特征在于反思性。这种共同体中的成员不仅共享共同体的情感、价值观和共同目标，而且也在参与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建构自身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成员都认识到了作为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统一性，共同体不再是外在的实现个体目标的条件，也不仅仅是情感的来源（桑德尔，2011）。在全球化导致人类社会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基于反思性的共同体观念显然更加符合国际合作的需要。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创造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一个无论好坏我们都共享的世界，一个没有

^①Pierre - Antoine Donnet. Chine vs Etats - Unis: l'incroyable bascule du soft - power Mondial , Les Echos , 17 June 2025 , <https://www.lesechos.fr/idees-debats/edits-analyses/chine-vs-etats-unis-incroyable-bascule-du-soft-power-mondial-2171077>; Ipsos. America's reputation drops across the world , 17 April 2025 , <https://www.ipsos.com/en-us/americas-reputation-drops-across-the-world>.

外界的世界”(Hardt and Negri, 2009)。共建“一带一路”最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实现一种更高水平的“心联通”。2014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时指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

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可以认为,这种“心联通”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性认识基础上,建立在对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高度相互依存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只有这样,共建国家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探索走出共同发展和新型国际关系的道路,世界各国才能都走上共同现代化的道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共建国家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承担责任、共享发展成果。双边、区域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国家之间联合的合作新形式,需要建立在共建国家对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协调,必然需要根据共建国家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水平来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

五、完善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 协调推进机制的路径

统筹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民的“心联通”,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前文的讨论,可以对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相关机制进行一些探索。

第一,进一步完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规划,使其更有效发挥统筹作用。“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是与共建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合作规划经过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见证,具有统领“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相关合作的地位。完善相关规划可以更好体现政府引领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突出作用,有利于充分体现“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的本质属性,更好贯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方向。为此,应该加强对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规划制定的研究设计,更加合理安排合作项目的结构布局,突出制定合作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第二,进一步深入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统筹实现“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与共建国家不同相关主体进行充分沟通和协调,有利于增进各主体对项目相关利益和责任的认识。为此,可以考虑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合作规划的宣传,加强对民间资本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明确政府的作用与责任。同时,国内各参与主体都应在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参与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未来可以在相关类别评价制度和体系中纳入体现企业能动性的内容。

第三,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夯实互利共赢的利益基础。目前“一带一路”合作范围已经扩展到 150 多个共建国家,应该体现更多的差异性。根据与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的不同水平,来开展“硬联通”和“软联通”的合作,更多体现差异化和梯次性。由于“心联通”可能体现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不同关系水平上,首先应立足于夯实共同利益基础,再寻求共同的价值观认同。需要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考虑到不同共建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思水平存在差异,需更加注意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之间

的平衡，在资源配置中更加突出市场导向。

第四，扩大我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吸引力。应从统筹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出发，进一步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比如，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以及鼓励加强各种形式的青年交流等，都有利于促进“心联通”。随着共建国家民众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认知和认同程度不断加强，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必然会获得更多国际认可与支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2. 习近平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
3. [美] 大卫·哈维，周大昕译 《世界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7年。
4. [美] 罗伯特·吉尔平，杨宇光等译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5. [美] 奥尔·扬，陈玉刚、薄燕译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7. [美] 约翰·罗尔斯，何怀宏、何包刚、廖申白译 《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8. [澳] 戴维·麦克唐纳、布伦登·奥康纳 《特殊关系：英美世界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载彼得·J. 卡赞斯坦主编，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译 《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9. [美] 迈克尔·J. 桑德尔，万俊人等译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2011年。
10. Alves, A. C. and Lee, S. H. China's BRI Developmental Agency in its Own Words: A Content Analysis of Key Policy Documen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50, February 2022.
11. Mayer, M. and Zhang, X. Theorizing China – World Integration: Sociospatial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Modern Silk Road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No. 4, 2021.
12. Summers, T. China's 'New Silk Roads': Sub-national Regions and Networks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9, 2016.
13. Jones, L. and Zeng, J.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8, 2019.
14. Wolf, M. Conservatism Buries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How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ts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Has Been Lost,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7.
15. Dixit, A. Economic Governance, in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6. Cohen B. J. Balance-of-Payments Financing: Evolution of a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17. Wade, R. H. 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4, 2003.
18. Bishop, M. L. and Payne, A.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fferent Globalizations: Theorizing Re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Vol. 18, No. 1, 2020.
19. Hardt, M. and Negri, A. Commonwealth,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责任编辑：郭霞

ABSTRACTS

(1) Build a Chinese modernization system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Zhang Yansheng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n urgent need to realize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global vis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major country, mainly invol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process of China as a populous, economic, and open country, which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unprecedented and complex impact o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attern and order in human history, China and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must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is. Therefore, we should deeply explore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faced by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study the general law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or economic rejuvenation,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failures, risks,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nd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ut forward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predictions.

(2)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new trends, new model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Li Yongjia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going global.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differs from the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from the overseas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stead showing new trends and new models. Overall,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are showing a shift from ‘going overseas’ to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ed resource allocation has made the overseas expansion no longer limited to labor – intensive industr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echnology – intensive products such as new energy vehicles, biomedicine,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going abroad, and expansion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processing stage, and the trend of full – chain overseas expansion is very ev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ing global, there is a shift from exporting products or capacities to expanding brands overseas; and transform from a single company’s independent overseas expansion to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the entire industrial ecosystem. In specific channels, there is a shift from going global through physical means to going global digitally, and apps going oversea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Some new cultural products creat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such as online games, short dramas, and trendy toys, have expanded new frontiers for cultural expor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ccelerat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3)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mechanism for “hard connection”, “soft connection”, and “heart connection”

Xie Laihui

Coordinating the “hard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soft connectivity”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the “heart connec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are prominent symbols of high – 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high – 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oordinating “hard connectivity”, “soft connectivity” and “heart connectivity”, and believes that this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del in the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period,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path of high – 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econd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d connectivity”, “soft connectivity” and “heart connectivity” was discussed, and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overall promotion work were analyzed,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it should be coordinated based on different goal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 community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inally,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are proposed.

(4)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ies

Tan Lu

Building a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for China to promot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In 2013, China's first Pilot Free Trade Zone –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with the core purpose of benchmarking against international high – standar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o conduct pilot projects, shouldering the significant mission of exploring new paths and accumulating new experiences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and expanding openness. As the first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the country,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has created a vivid example of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openness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reform,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have been replicated and promoted nationwide, fully playing the role of a “testing ground” for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exploration of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categorizes i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alyzing in depth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by enhancing foreign trade,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leasing market vitality. At the same time, select typical foreign Pilot Free Trade Zone as research cases to analyze thei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the main institutional element differences compared to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higher – level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China at a new stage.

(5)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digital trade n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erspective

Tang Jing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landscape and becoming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rade globalization, developing digital trade ha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optimizing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elects 20 economies with relatively active digital trade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the explici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digital trade, and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digital trad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Ireland, and India have all performed excellently in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dimensions, ranking among the world's strong powers in digital trade.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al measures of the four countries mentioned above, revealing their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inally, propose the path choices and policy ideas for China to build a strong digital trade n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digital trade nation in China.

(6)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Zhai Yujia, Liu Meng, Chen Yan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again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on climate action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global confid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emphasizing that both parties will jointly play a leading role and expressing their determination to firm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lacks sufficient synergy and still needs to leverage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but there is still broad space for cooperation in green and low – carb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he face of the temporary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ntries should still work together firmly to tackle this significant global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China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and leader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jointly expand new cooperation space fo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7) The differentiation, game, and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ESG development

Cao Hui, Zhang Xiaoxi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global sustainable